

中国“三大倡议”引领全球人权治理

□ 本报记者 王卫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

中国作为《宣言》起草的积极参与者，75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倡导和践行《宣言》。特别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的提出，为人类社会破解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文明冲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热烈响应和广泛认同。

以发展促进人权

2021年9月21日，中国领导人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旗帜鲜明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旨在重振2030年议程，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两年来，中国践言履诺，垂范先行。从宣布32项务实举措，到召开“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从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到设立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从组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到宣布推出100亿美元专项基金……中国不断细化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路线图、行动表，推动倡议实现从“打基础”“搭框架”到“强合作”“显实效”的跨越。

在全球发展倡议助力下，老挝政府延续了为偏远地区1400多所学校超过13万名学生提供营养餐的国家校餐计划；吉尔吉斯斯坦妇女在“知识女性、知识国家”培训班上学到了信息技术、商业规划、网络营销等“新潮”课程；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的5300户难民家庭在收到家庭应急包、生计工具包、屋顶搭建包后，开始自建安居之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近千户家庭也将告别脏乱差的棚户区，搬进整洁明亮的新楼房。

全球发展倡议一步步走深走实，为国际社会凝聚发展共识、优化发展资源、解决发展难题，实现了对发展问题的再聚焦、对2030年议程的再提振，对国际发展合作格局的再塑造，彰显出中国作为全球发展倡导者、发展合作行动派的大国本色和大国担当。

作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各方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同2030年议程高度契合，将为应对共同挑战、加速实现包容、可持续未来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充分支持也愿意和中国在这一方面加强合作”。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开幕式上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一包容性倡议顺应了建立新的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时代潮流。”

乌干达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斯拉埃尔·穆希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南方的意义》的文章中写道：南方国家缺乏推动全面发展所需的技术、制度、专业知识和资金，因此，中国提出的全球发



图为2022年8月3日，在黎巴嫩南部省提尔市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地，中国维和官兵参加中国第20批与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指挥权力交接仪式。

新华社发

展倡议是朝着解决大部分南方国家所面临问题迈出的“可喜一步”。

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称，在全球人权治理中，中国主张以发展促进人权，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以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保障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发展红利。

以安全守护人权

2022年4月21日，中国领导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时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指明了清晰路径。

一年来，在应对各类传统、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行动成效显著。同各方深入开展安全理念交流和政策沟通，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释了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重点合作方向及合作平台和机制；积极开展斡旋外交，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坚定站在和平一边；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推动通过《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为解决当前粮食危机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还积极推进国际安全对话交流，推动非洲地区国家举办首届“中国-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就促进地区和平、发展和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维护非洲安全稳定注入正能量；成功举办第二届中东安全论坛，就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四点建议；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亚合作各机制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各方开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与合力。

“中国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公正化，为充分实现人权创造法治环境和安全秩序。”张文显说。作为中国贡献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已有80多个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对倡议表示赞赏、支持，倡议明确写入20多份中国同有关国家和组织交往的双边、多边文件。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片面追求自身安全的思维，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追求的是共同安全，是强调和平、合作的安全观，有利于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国际秩序。

“中方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表示，各方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同中方携手一道，和平解决争端。

“亚洲需要发展亚洲共同安全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刘振民认为，亚洲各方依托区域合作机制，拥有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各方可以携手合作，共同创建亚洲安全架构和安全原则。

巴基斯坦前总理国家安全顾问优素福表示，亚洲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危机预防和应对方面达成共识，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以文明滋养人权

2023年3月15日，中国领导人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情怀，对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拓展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关注发展到关注安全，再到关注文明，既是

中国对于自身现代化道路认识的深化，也是前两个倡

议水到渠成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就是中国倡导和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产物。中国以其为内容和载体，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不同于以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旧文明观，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纠偏，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文明观。

中国不断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且充满活力；不断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方式，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新形态；不断探索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丰富和发展人民精神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效方式，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增添了新认识，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拓展了道路。

希腊帕特里亚大学教授帕夫洛斯·康托斯对全球文明倡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领导人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他对此深表赞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必要的，而不是一种选择。”

对于中国在促进文明对话方面作出的努力，雅典大学哲学学院前院长埃莱妮·卡拉马伦古表示赞赏。她认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可以成为所有参与国的知识财富来源，人类应当向加强文明对话这一进步方向迈进。

“几千年来，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和艺术等，这就是世界的魅力所在。”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部考古与博物馆司副主纳西尔·汗表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和关于“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的主张正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充分体现，尊重世界文明、艺术、文化和遗产的多样性将为全世界人民开展交流与合作注入力量，是助推人类和平与发展一个理想路径。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付子堂认为，“三大倡议”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又共同构成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作为“三大倡议”的提出者和推进落实的行动派，中国既着眼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又致力于全人类共同福祉，为以积极行动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指导。

韩国“价值观外交”受质疑

环球观察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釜山申办2030年世博会以失败告终，由于在首轮投票中仅获得29票，这不仅令外界诧异，也引发韩国国内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韩国总统和总理分别道歉，但韩国国内对此的反思仍在持续。“得票为什么这么少？”美国《外交》杂志尖锐指出，韩国政府的傲慢和错误自信导致谈判破裂，世博主办权投票结果“暴露了韩国外交、战略和情报一塌糊涂”。甚至有韩媒用“韩国当前外交走入死胡同”来形容“价值观外交”的结果。

申博失败

当地时间11月28日晚，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展览局第173次全体大会投票选出沙特首都利雅得为203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利雅得在第一轮投票中以119票成功胜出，韩国釜山仅获得29票，意大利罗马获得17票。

“太令人尴尬的申博失败”，韩国《忠清日报》社论称，韩国申办釜山世博会失败了，从投票结果看，简直可以用尴尬二字形容。韩国政府一度乐观认为，“在第一轮投票表现出色，韩国将在第二轮投票逆转局面”。但这种盲目乐观反而证明了韩国政府的外交能力和情报能力都是失败的。

“无能，花钱却没有实际用途的兜售外交”，韩国《京乡新闻》报道称，为什么利雅得赢，而釜山输？一方面，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于2016年宣布了“2030年愿景”，2030年被定为沙特摆脱贫有石油依赖经济，进入创新发展模式的起点，同年举办的2030年世博会，自然被认为是向世界展示沙特变化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釜山市市长朴晋俊多次通过媒体对外宣称：“韩国克服了不利条件，做得很好”，这暗喻釜山方面知道自己正在发力时间点，申理由、申办战略等方面落后于沙特。尽管如此，总统、市长和各大财阀仍在全力张罗，试图制造一个“逆转胜”。其结果就是，即使进入第二轮投票，且釜山吸收了意大利的全部票，两者之和也不足沙特获得票数的一半。

误入歧途

有人指出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失败，只有韩国政府不知道，其余所有人都能猜到结果。还有人指出，这是与国际秩序多极化背道而驰的所谓“价值观外交”造成的失败。韩国政府谈判国际多极化趋势、全力开展美日外交，是釜山

申博失败的根本原因。

根据韩国总统办公室的说法，总统尹锡悦为了申博会见了96个国家领导人，花费高达4亿美元进行游说。韩国外交主要精力集中于申博，部长和高官们在全世界到处游说。甚至韩国的第一夫人都身穿有釜山世博会标记的衣服接见外宾，但这次釜山申博外交完全“误入歧途”。

有不少专家指出，韩国政府的外交不具有包容性，招致国际孤立。还有分析认为，韩国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力存在问题。韩国官员宣称他们的策略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并不具体。相反，沙特在申办过程中则提出了值得支持的具体建议，比如扩大进口数十亿美元的商品，为非洲国家提出了发展计划。沙特还提出了2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主张进一步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在全世界陷入经济混乱和冲突阴云的危机时期，多数国家很难拒绝沙特的计划。虽然韩国政府的话讲得很好，但与沙特的提议相比显得“廉价”。

关系紧张

“走进死胡同的韩国现政府外交”，《韩民族新闻》报道称，韩国外交现在不仅在多边外交场合暴露乱象，甚至透支费尽心思的韩日关系也再次出现裂痕。

韩国《税收日报》22日报道称，由于未能在11月15日至17日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元首会谈，尹锡悦的外交政策正受到批评。在11月26日韩国釜山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韩国外长朴振时表示，两国关系好双方受益，反之双方受损。这个道理也永远不会变。双方应共同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科技问题工具化、经贸问题泛安全化的倾向，维护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当地媒体认为，这实际上是对韩国政府的“偏向外交”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已经恢复的韩日关系也再次出现裂痕。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在釜山会见朴振时，就首尔高等法院认定日本政府对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负有赔偿责任的判决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该判决“违反国际法”。对此，朴振回答说：“2015年《韩日慰安妇协议》是两国间的正式协议，我们予以尊重。”

埃及“解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伊德里斯表示，韩国现政府一味奉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以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区分不同国家的亲疏远近，特别是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导致“申博”铩羽而归，成为这个东北亚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必然结果。

自民党派系涉嫌违规遭检方调查

□ 本报记者 苏宁

近日，日本自民党派系长期违规开设“小金库”躲避监督的丑闻遭到曝光。自民党最大派系安倍派被指至少在过去5年内，通过售卖政治筹款集会入场券(下称集会券)而不记账的方式违规囤积“小金库”，累计总额超1亿日元。该派系超过10名议员被怀疑参与其中。除安倍派外，自民党其他派系也被指存在同样问题。据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计划对数十名自民党议员开展问询调查。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偶发个案，而是自民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有组织、习惯性做法。此次问题的曝光，再次引发了日本社会对政治资金丑闻调查的批评。后续，日本检方调查进展情况，是否能够立案以及是否会引发对《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值得关注。

重点指向安倍派系

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此次曝光的违规开设“小金库”问题重点指向自民党最大派系安倍派。其违规开设“小金库”的基本手法是，派系所属国会议员在完成派系分配的售卖集会券指标后，多卖出的部分将作为回扣退还给各国会议员，并且，对于回扣的数额，派系和国会议员都不在收支报告书上记账，这样，这部分资金便成了可逃避监督的“秘密经费”。据目前日本媒体掌握的情况，截至2022年的5年间，自民党安倍派采用这种手法至少违规囤积了约1亿日元的“小金库”，并且，自民党其他派系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

向个人、企业及团体售卖集会券是日本政党筹集政治资金的主要方式，自民党安倍派的集会券定价每张2万日元。5年来，自民党安倍派通过售卖集会券共募集到约8亿日元政治资金，而其中的八分之一变成了国会议员个人支配的“秘密经费”。按照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精神，政党对政治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上述操作显然违反这一原则。

《京都新闻》社论指出，自民党安倍派的违规操作已经不能用“工作失误”解释，而是有组织、习惯性的规避监督和隐瞒资金流向行为。

自民党违规行为的曝光无疑加重了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岸田内阁的危机感。连日来，首相岸田多次就事件



2021年11月10日，议员在日本东京国会众议院出席会议。

新华社/共同社

作出回应，在向国民表示遗憾，表态挽回信任的同时，要求自民党当前加强自律，认真整改，说明情况。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针对事件指出，自民党有必要向国民作出说明，妥善处理，挽回国民的信任。

现有法规存在漏洞

为防止政治腐败问题的发生，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对企业、团体及个人向政党、政治家提供资金支持进行了规定和限制，如禁止企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捐款，向政党捐款超过每年5万日元时需实名登记等，但是现实中存在规避监督的漏洞，特别是对售卖集会券的规定存在不完善之处。

《京都新闻》指出，除了一次购买10张以上入场券需要实名登记外，大多数集会券都是以匿名方式购买的，无法确切掌握售卖集会券的数量，这就相当于对核查政治资金来源开了一个“后门”，增加了监督难度。

另外，在现有法规制度下，对于来源不明的资金，只要在收支报告中记账，就可以合法地“洗白”，然而，自民党内有关派系刻意不在收支报告中记账，目的只是为了囤积可不受监督、随意使用的“秘密经费”。

针对此次曝光的问题，日本一些在野党提出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的要求。

5日，日本共产党向参议院提出禁止企业、团体购买集会券和向政党捐款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改

意见。

日本国民民主党也就修法展开讨论。党代表玉木雄一郎指出，“之所以发生此次问题，是由于大家都认为即使未在收支报告书中记账，只要在事发后补记就没事了”，主张修改现行法律的罚则规定，加重处罚力度。

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表示，首先要理清问题，在搞清事实之后，再考虑从制度方面完善监督。

另外，虽然仅有少部分，自民党内也有声音认为应当修改完善现行法律规范。

调查进展值得关注

针对自民党违规行为，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已经展开调查。据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已经有多名收受回扣的国会议员的秘书接受了检方的问询。另据多家媒体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正从地方抽调工作人员组成专班，计划在临时国会休会的13日正式启动调查工作。

有消息称，安倍派相关财务人员在接受检方面讯时已经表示得到了派系事务总长的授意。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事实如果真如此，事务总长则存在“共谋”的嫌疑。一般而言，派系的事务总长最清楚政治资金的收支流向，因此5年来的历任安倍派事务总长有可能会成为检方调查问询的重点对象。由于派系事务总长都是重量级国会议员，下一步，是否有重量级国会议员成为被调查对象受到社会的关注。

对于检方调查的后续走向，原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官谷合洋司分析称，此次调查最终是否会立案，取决于办案机构的决心以及证据搜集情况。如果大事化小，可能只是以起诉派系的财会人员了事；如果能拿到上级授意的证据，就可能逮捕派系干部；如果发现议员将“秘密经费”揣入个人腰包，则构成贪污或欺诈。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岸田不属于安倍派系，但在国民眼中，涉政治资金的违规行为已经不是派系，而是自民党全体问题。有自民党议员指出，多名安倍派国会议员收受回扣超1000万日元。今后，随着调查的深入，万一出现重量级人物被逮捕的情况，必将引发舆论对政权的抨击，将对政权造成沉重打击。

今后，检方调查的进展情况值得关注。